

阿美族食用野菜知識的跨界流動與知識競爭

張瑋琦*

採食野菜是阿美族傳統的生活文化，野菜的知識原本在各地阿美族間傳承應用。然而到了近年，受到追求健康及異文化飲食風潮影響，不同族群或不同目的行動者加入阿美族野菜知識的再生產，在各自的目的下，野菜的不同功能被特別強調；各自的行動者為了強化野菜與自身目的連結，而在論述上採取了鞏固知識疆域與模糊知識疆域的策略。本報告從阿美族的野菜文化談起，進而討論在消費文化的刺激下，野菜的知識疆域如何形成、不同的行動者間之知識競合又如何促成疆域的流動。

一、阿美族的野菜文化

中文所謂的「野菜」，指的是林野地裡自然生長而非工業化大量生產的可食性植物資源，其使用範圍相當廣泛，包括菌類或植物的根、莖、葉、花、果（張宏志、管正學、王建立，1998）。事實上「野菜」乃民間俗稱，人類學謂「植物性採集品」較為精準且不帶有階級意味（溫遂瑩，1962）。採集，是許多臺灣原住民族傳統上獲取植物性食物的重要手段，特別是居住於山腳平原、河海沿岸的阿美族，生活環境多野生食用植物，「食草」乃成為其飲食文化特色。依賴大自然的供應或許收穫不易穩定，但如果自然生態的支持力足夠，卻是一種相對勞力付出不高的生計模式。

早期臺灣原住民的知識記錄多來自有文字能力的異族或殖民統治者，野菜雖以物質性資源之姿蘊藏於原住民的常民生活實踐中，但由於非屬主食作物，不論明、清及日治時期的文獻，甚或戰後中央研究院出版之原住民民族誌中，被記述的十分有限。即便阿美族是全臺灣原住民當中野菜食知最為豐富，宣稱日常生活中得以應用 200 多種野菜植物的族群，但以中央研究院 1962 年出版之《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一書為例，書中所記載的野菜植物，僅現身於〈飼養與採集〉中「採集品」小節之

* 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副教授。

「植物性採集品」段落，以及第九節〈飲食〉的「採集食物」段落，以羅列的方式小篇幅記載（李亦園等，1962）。從異族所撰寫的文獻史料中並不易感覺食用野菜對阿美族是重要的文化現象。1980 年代以後，受現代化教育的原住民知識份子掌握族群知識的論述權，由他們主筆出版的民族知識相關著作（包括族群字典）逐漸增多，也讓我們看到不同視角的知識論述。

阿美族把人類生活分為靈魂界生活（kahtakawas no tamdaw）及現實界生活（nohkal no 'orip）。靈魂界生活圍繞著 kawas 概念。kawas 一詞在阿美族的語境中，用來指涉靈魂界的一切鬼神精靈，包括善靈及惡靈，有的 kawas 有名字，有的沒有。關於野菜的 kawas，在《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中指道：「採集野果野菜的神亦與農業的神一樣是神譜中第七代的 maavok 和 masriu，若干野果並有專門的神（溫遂瑩，1962: 91）」。大多數「附有精靈」的植物屬於野生植物（no lotokan a malgaway），其中也包括樹木類。在飲食上，「人神共食」，是理解野菜地位的重要關鍵，透過人神共食獲得祖靈的祝福。

二、野菜商品化

在早期的民族誌研究中，野菜採集屬於非經濟性的日常活動。尚未接觸外來文化之前，阿美族並沒有果園或菜園的概念，因為山中的野菜資源豐富，阿美族鮮少種植蔬菜（黃貴潮，未出版: 23）。男女老幼不分性別，只要有空閒或工作順便，皆可採集；甚至年老的婦女們還有一種原始的採集組織，成員約四至八人，一起到遠離部落之處採集，日出而作、日沒而歸（溫遂瑩，1962: 91）。1965 年代左右，隨著臺灣工業化發展，阿美族人（特別是男性）開始向工廠及都市尋找工作機會，梧桐木外銷事業及網球拍外銷工廠的成立等，促進花蓮市的都市化，也鋪就了野菜商品化的契機（吳雪月，2002）。花蓮縣吉安鄉黃昏市場、光復鄉市場的阿美族野菜區，滿足了都市化的生活形態下，阿美族人的傳統飲食欲求。

2000 年以後隨著消費時代的成熟，原住民文化成為異文化體驗的對象，受到產量需求的影響，「野」菜逐漸向「蔬」菜的經濟生產體系靠攏，生產型式從非商業的勞動，演變為勞動力商品化；生產資源從共有

資源的野地採集，轉變為採集、菜園生產、向批發商批貨三者兼用；流通對象從家／族內流通，擴展為族群外流通，而後者建立在通路（市場攤位、超市上架）的掌握能力上，而此一轉變與農政及縣政等政策單位的參與不無關係。野菜做為一個經濟資源，吸引了不同背景的行動者涉入野菜經濟體系，包括野菜生產的研究與輔導部門、野菜知識的搜集與展示部門，以及野菜行銷的傳播媒體部門等。野菜被帶進市場之後，才有場域，進入場域以後，才有象徵的鬥爭（黃啟瑞，2000:111）。我族與他者之區辨——「誰的」以及「什麼是原住民野菜」——逐漸成為野菜論述重心。

三、野菜知識的疆域與競爭

在綠色消費主義及環保意識的雙雙加持下，原住民的飲食文化逐漸受到主流消費市場的關注。因應這樣的潮流，花蓮農改場自2009年起即著手生態有機環境建構試驗，在花蓮縣設立數個野菜示範農園進行品種改良及作物推廣。生產部門的一些在地的農場或自主地或受農改場的輔導開始大面積種植野菜；行銷部門的地方農會及其通路開始建構野菜行銷網絡；而政府部門（如中央的原民會及地方縣市鄉鎮）開始訂定「原住民族野菜產業輔導」計畫，提供阿美族野菜的餐廳日漸增加，「野菜產業化」的趨勢逐漸成形。大體上來說，近十年來參與花東野菜論述的行動者，其立論基礎可追溯自三種不同知識體系——原住民知識體系、永續食農知識體系及工業化農業知識體系稱之。透過原住民有機農場、農改場及漢族有機／生態農場的訪談，我們發現三者之間的知識競合關係。

原住民在野菜的論述上經常首先透過一種文化上的傳承關係（例如：「爸爸媽媽教的」），來強調其與野菜的關連性，或追溯一種自然的根源性質（強調原生種），而在生產技術上強調對自然的模仿。以上我稱之為以原住民知識體系做為野菜論述的戰略位置。

強調永續食農知識體系戰略位置的包括原住民或漢族的知識菁英，他們叛逃自科技或現代化殖民，崇尚「自然」及「永續」的普世價值且樂於接納與其核心價值相符的部份原住民知識。他們的社會身份非常多元，包括：生態解說員、生態休閒農業經營者、自然或有機農業實踐者或友

善農食餐廳，他們的戰略位置敏感地反應時代趨勢與前瞻議題，顯示其對資訊的掌握能力。他們的論述具有以下幾點特色：（1）以外來的環境知識為核心價值，結合在地環境及物種特色；（2）生產技術強調自然主義生態觀之人為介入管理；（3）知識的階層化現象。

工業化農業知識體系我用來指稱以現代化農業為基礎，將工業化的生產模式與產業觀——效率化、規模化與利益導向——應用於農業的這類論述之知識來源。其論述具有以下幾點特色：（1）市場導向的知識創新；（2）技術知識與商業市場邏輯的整合；（3）資本與勞動的族群階層化現象。

本討論將分析不同身份的行動者如何在三種知識體系間採取戰略位置，或鞏固其中一種知識位置，或在三者間跨界游移，其結果帶來體系間的知識流動，豐富了阿美族的野菜知識，也在知識的辨異、疆域的再創造中強化阿美族自身的族群認同。

參考文獻

- 吳雪月。2002。〈從交換到交易—花蓮縣吉安鄉「黃昏市場」阿美族野菜區的民族誌研究〉。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亦園等著。1962。《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張宏志、管正學、王建立。1998。〈中國山野菜資源開發利用研究〉。《資源科學》，20(2): 53-58。
- 黃啟瑞。2000。〈原味與市場—另一種 Amis*植物人文的探究〉。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貴潮。未出版。〈阿美族生物觀〉。未出版手稿。
- 溫遂瑩。1962。〈飼養與採集〉。李亦園等著：《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頁 85-94。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